

云南边境地区 民族教育考察

李孝川

著

YUNNAN BIANJING

DIQU

MINZU JIAOYU

KAOCHA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三卷

· 1 ·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YUNNAN

云南边境地区 民族教育考察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省教育学一级博士学位点建设学科资助项目

云南边境地区 民族教育考察

李孝川

著

YUNNAN BIANJING

DIQU

MINZU JIAOYU

KAOCHA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向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考察 / 李孝川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626-9

I. ①云… II. ①李… III. 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事业—研究—云南 IV. ① 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3734 号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考察

YUNNAN BIANJING DIQU MINZU JIAOYU KAOCHA

李孝川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8626-9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边境或边境地区既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又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从政治学的语境看，边境是远离国家政治中心靠近边界或国界的边陲地区，是边疆的边缘地带。边境的核心属性是国家属性，边境的形成、转变和最终确定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家形态的变迁、国家意志的强弱、国家发展策略的指向。从地理学的视角看，边境又是一个空间概念，即靠近国界的领土。边境地域空间包含自然地理空间、民族文化空间、历史传统空间、宗教信仰空间等，也呈现出与毗邻国家山水相连、气候相近、物产相似，不少民族同根同源、文化习俗相通、跨境而居的典型特征。

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直接接壤，陆地边界线长约 4061 千米，在沿边线一带有 16 个少数民族跨界而居，这些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属于直过民族，即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或者属于少小民族，即人口较少民族。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璀璨的多元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云南边境地区总体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仍处于整体贫困和封闭状态。

长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的建设与发展，重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尤其是自“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富民兴边行动”（2000）、“桥头堡”发展战略（2011）和“一带一路”（2013）倡议等国家政策实施以来，云南边境地区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从发展的末梢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经济合作、人文交流

的窗口。改革开放给边境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和众多利好的优惠条件,但随着边境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与国内外信息联通、人员来往的进一步密切,也带了边境地区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封闭与开放的对峙,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冲突,导致了原有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解体,传统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的凋敝,道德行为的失范等突出问题。

边境教育是影响和制约边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边疆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边境的特殊性给边境教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边境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边境教育具有民族教育的基本属性,必须适应不同民族的发展需要,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色;边境教育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边境教育既要承载历史的积淀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还需要在传承中实现自身的超越;边疆教育肩负着多重功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实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要途径;边境教育是促进边境地区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承载着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知识、能力,能够以一种包容的、开放的、进取的精神,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的一代新人的重大使命。然而,边境教育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学校教育往往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呈现出基础设施不足、办学条件差、教师队伍单薄、管理水平低下、教学质量令人堪忧的状况。以滞后的教育发展水平去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去面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变革的需要,去适应学生、家长和社会多元文化的诉求,去迎接当前迅速变化着的、新的机遇与挑战,边境教育何以承载、何以担当?

鉴于此,该研究聚焦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借鉴文化哲学、政治文化学、教育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在参考吸取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解读云南边境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对边境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进行合理性分析,旨在拓展边境民族教育研究视野,探索有效促进边境民族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方法路径。无疑,该研究不仅具有丰富民族教育研究视域、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化解边境民族教育面临问题,夯实边境地区多元文化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基础的实

践价值。

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该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该部分主要涉及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本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同时,阐述了研究对象区域的选择依据,规范了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的客观标准。

第二部分为研究区域的民族志考察。重点是从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历史沿革、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生活周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结构类型、生活习俗的多样性,以及当地民族教育的基本状况和民族教育的属性特征入手,对边境地区的基本状况进行概括和总览。

第三部分对研究区域开展定量研究。该部分以理论推导的方式,结合前期大量访谈所了解到的相关信息,编制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并从数据分析的层面提炼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

第四部分为研究区域的质性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从边境自身的生态环境、当地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以及当地学校场域的特殊性六个维度对边境地区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归因分析。

第五部分为发展思路和对策研究。基于对研究区域的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探讨了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思路和可行性路径。

得益于作者长期关注边境民族教育、研究民族教育问题,坚持深入边境民族地区的学校、社区开展田野调查,进入村落、家庭进行参与式观察,该研究成果视角新颖、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形成了以下鲜明的特色:

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实践性和针对性。研究聚焦当前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诸如民族教育发展特色与“瓶颈”、民族教育问题的系统分析、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边境教育安全等,并且关注问题的形成、把握问题的症结、分析问题的成因、谋划问题的解决。二是学科交叉,研究视野开阔。研究不仅借鉴了教育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 and 观点,而且从国际环境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从云南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与边境民族教育发展定位的中观层面,从研究样本区域与若干典

型案例分析的微观层面，探讨了边境民族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提出了新时期云南边境民族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实施策略。三是注重理论的奠基性和先导作用。研究不仅认真梳理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力图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框架，为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清晰的路线图，而且注重对边境民族教育问题的理论分析，对民族教育与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为云南边境民族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依据和参考。四是提出了一些鲜明的、值得关注的观点。例如，应客观地评价、重视和发挥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中的主体性，实现从“要我发展”的被动状态向“我要发展”的主动状态转变。又如，强化边境教育，尤其是边境学校教育的文化功能，学校不仅要传承民族文化传统，更要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再如，边境民族教育发展既要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又要考虑自身的特殊性，准确定位发展的目标、进度与方式，防止出现民族教育发展脱离边境实际的“错位”现象。

边境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需要借助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进行跨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系统构建。边境民族教育变革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因而需要坚定在传承中与时俱进、在创新中求发展的信念，坚持在长期的实践中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边境民族教育发展是人们的事业，因而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发挥第一责任人的作用，需要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和参与，需要边境地区不同个体发挥主体精神，以不同的方式融入边境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之中。本项研究就是为边境民族教育发展尽的一点绵薄之力。本书的出版，在期待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之余，更期待引起社会各界对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关注、支持和参与，期待边境民族教育有更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王 凌

2017年9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
第三节 相关研究动态	18
第四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
第五节 研究的伦理道德	24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范式和工具	27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范式	27
第二节 研究区域的选择	30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步骤	32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步骤	34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	39
第一节 云南省区域概况	39
第二节 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44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概况	52
第三章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66
第一节 主流价值的诉求	66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向往	109

第三节 学校教育的乏力	152
第四章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177
第一节 生态环境的影响	177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影响	184
第三节 经济层面的影响	191
第四节 政策层面的影响	196
第五节 文化层面的影响	202
第六节 学校层面的影响	209
第五章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优化发展路径探析	219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动力基础	220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特色机理	223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225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231
结 语	254
附件一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调查问卷（教师版）	258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调查问卷（学生版）	263
附件二 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教育调查访谈提纲	268
附件三 马关县调研报告	275
附件四 瑞丽市调研日志	287
附件五 勐腊县调研日志	303
主要参考文献	32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民族文化资源的断裂危机

从民国初年开始,我国在借鉴欧美和日本的学制时,学校教育就以城市为蓝本进行设计。这一设计蓝本更多地考虑了城市的发展状况,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现实差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城乡教育的趋同化倾向。“这种沿袭至今的教育设计架构暗含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将通过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和摹写而实现。乡村学校教育设置的内涵思路也是对城市学校模式的移植和摹写。”^①基于这样的城市移植思路,边境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同样采用单一化的城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村学校教育的特殊性,使其发展逐渐遭遇“瓶颈”,特别是目前,整个乡村学校教育的价值目标都在向城市转向,在城市学校教育价值目标体系的影响下,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被赋予与城市学校教育一样的格调。乡村学校教育被迫承担起与城市学校教育同样的目标和职责。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空间而存在的乡村学校,时刻体现着权力的运作过程,并通过一种规范的例行化方式维持着这种空间的存在。在这一运作过程中,权力呈现出一种隐匿的状态,以规范化的特征表现出来,学校也因此成为一个规训化的组织机构。学校教育在这一规训化的要求中,对被规训的对象——学生群体进行行为的规范和训导,并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的规约,使学生群体成为一个被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所认同

^① 李小敏:《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二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的“合法化”成员。

学校教育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使边民逐渐疏离原有的空间位置和时间脉络,使学校生活占据学生绝大多数的生活时空,以此对学生群体实施规训。学校通过统一设置的课程表、按部就班的作息表、严格的纪律及其隐匿的意识形态符号等,对边民群体进行思想上的规训,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渗透到边民的大脑中,并转变为边民个体的自觉行为,使边民成为国家制度认同和符合社会价值标准取向的现代公民。这一同质化的学校教育设置模式与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思路是一致的,以培养离开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优秀乡村学生为旨归。“这种以乡村同质化的方式来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实际上隐藏着对乡村改造的设置思路,其结果是地方性知识价值的贬低和合法性的丧失。”^①学校通过一系列的规训逐步确立了自身的空间构建,民族学生进入学校的空间构建中,就意味着从乡土散漫的氛围进入一个严格渗透着权力的制度化场域,主动接受着社会所认同的文化规训,而民族学生在这样的空间调适中是存在局限性的,而且进入学校场域的时间越长,离乡土的生活就越远。因为学校在将边民纳入一种充分体现公民身份的体制中时,却与当地民族社区和家庭的情境相脱离。学校教育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场域里展开的,学校的运作模式无形中都渗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处于村落社会中的学校,是国家形象的直接呈现形式,国家通过学校这一场域把主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村落社会中,学校教育的取向不再与村落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相符合,反而越来越体现出城市化和工业化乃至全球化的价值观,其发展思路暗含着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的诉求,这一乡村改造路径是建立在排斥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牺牲少数民族地方传统文化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来加以确定的。然而,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并未使边民的子女成功地从当地社区的控制情境,即他们所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抽离出来,也未成功将其纳入现代城市社会的“抽象体系”中。相反,为了与社会空间进行联结,乡村学校教育切断了与当地社区和家庭等非教育空间的联结,将受教育者与

^① 李小敏:《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二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区分,从而使学校教育从当地民族社区和家庭的场景中抽离出来。^①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边民子女自从进入学校场域后,就在不停地接受着学校教育的规训,而当地学校场域往往处于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相脱离的状态中,少数民族学生在该场域里被动地学习着一系列陌生的抽象化的文字符号,这些抽象化的内容又反过来促使处于社会化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与其朝夕相处的社会与家庭生活相分离,当地民族社区和家庭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和学生群体在学校场域里所习得的抽象化的符号其实并未产生本质的联系。在学校场域里,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与其传统生活方式相去甚远,而与城市生活较为接近的现代生活理念,这种理念强化了其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从而加速了其与本民族社会和家庭的疏离。^②

在学校教育设置的外向型前提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学生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他者世界”的强势价值预设,心灵深处充满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村落社会与地方性知识逐渐被设置于价值讨论的范畴之外,这种以牺牲村落为代价的乡村学校教育发展思路的弊端其实早已显现出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乡村人口基数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和工业化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过分拔高乡村学校教育以便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而排斥与村落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观点其实是不合时宜的。^③

加之乡村的学校教育在“汉文化”的强势文明话语系统下,往往否定自身的民族文化,忽视民族文化理念的保持和传承。而这些文化上的忽视和否定通常阻碍了当地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如果受教育者不能继续升学、走出村落,找不到工作,边民家长和学生通常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上学、升学、进入城市、获取报酬成为多数边民家长送子女读书的初衷,也是边民群体衡量读书是否有用的基本准则。于是,学校从当地社

① 石艳:《区隔与脱域——学校空间管理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2006年第8期。

② 李卫英:《民族学校教育中的隐性力研究——对黔南石龙乡布依族苗族学校教育的田野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③ 张济洲:《农村教育不能永远姓“农”——论城乡教育关系的现实定位》,《教育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

区场景中抽离开来,民族学生群体在这个空间场域里感受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强大引领性,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疏离。

二、民族多元文化的消亡危机

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其所生活的特定时空情境而自发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习俗、语言信仰、服饰建筑、社区组织形式、社会制度以及民族心理,并逐步具有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征。现存的民族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记载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传说和历史事件等。同时,每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迁都与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在彼此的沟通和合作过程中以特有的形式展现出来,呈现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学校场域中的民族学生群体发挥着特有的教育功能。但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国家高考政策的统一指挥下,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同样受制于社会市场规则。基于这样的实情,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民族群体往往也盼望着能通过学校教育这一路径获取进入主流社会的各种资本,并借此达到向上流动的最终目的。为此,当地的学校教育不会对其文化作出积极的反应,也不会给予当地社区更多的关注,更不会将其纳入当地学校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因为这会对学校规程产生直接影响,也会直接影响当地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学校不仅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域,更是培养国家公民和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核心机构,在充满世俗的村落中,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象征物和宣传灌输国民意识和认同的重要场所。文化以及经济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民认同和国民意识存在差异,其中包含城乡民众对基础教育看法的差异。乡村学校,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入学率低、辍学率和失学率较高等现象,便是这一系列差异的外在表征。

在现代化的学校教育场域里,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被大多数民族学生所忽视,由此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民族语言、建筑服饰、生活习俗等的淡化或消亡,继而形成了民族学生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不认同,从心理上与自身的民族文化疏离开来,成为缺失民族文化归属感的群体。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边境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与社区和家庭教育的疏离是大部分民族学生学业失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不认同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族群体所生活的社区与家庭是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所在,民族群体在社区与家庭中获得了本民族的文化惯习;同样也使得民族文化的惯习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得以保持和延续。一旦民族文化在群体中弱化或消亡,民族成员对自身的认同就会产生一定的混乱。民族学生从社区与家庭进入学校空间,学习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毋庸置疑。但是,学校教育的形式不应当游离于民族学生所生活的传统文化之外,不应当使民族学生进入学校后就断然处于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中,这很可能使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出现混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民族学生对全新的文化盲目追崇,继而出现轻视或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形。“一个文化因素,在它本土的社会体内本来是无害的或者是有利的,但是在它闯入的另一个社会体中,却很容易产生意外的、极大的破坏作用。”^①因此,现代学校教育如果轻视民族学生的传统文化经历,不尊重民族群体既有的文化模式,那么,这样的学校教育要想在民族地区正常发展是有一定难度的。有学者也曾提出:“在以往有关教育和文化的研究中,论者多关注于教育的传承作用,并对教育在文化创新中的功能大加褒奖,岂不知,造成文化丧失,也是教育的一大‘功绩’。文化丧失,从其教育根源来讲,是由于教育依循社会价值观念的更迭,在一定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目的的引导下,将这种文化剔除于传承的范围,使文化在代与代之间形成‘断层’,失去继续传承下去的根基。”^②在云南边境民族聚居区,由于学校教育的“大一统”设置及其民族教师缺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致使民族学生很难从学校教育里习得有关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相关的地方性知识。长此以往,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在教育同质化的倾向中面临消亡的困境。

三、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危机

一直以来,我国的一个现状就是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这就使得农村长期存在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加之我国一直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举措,

^①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下,郭小凌、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②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使原本就存在极大发展差距的城市与农村的经济水平更加悬殊,农村地区长期的低投入、低产出、低收入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农村人口成为自由度较高的劳动力,加之农村经济已无法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进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就自然成为农民的必然选择,这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提供了条件。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的流动,社会分层不可避免。要对社会流动有更清晰的认识,就应该从个体自身的角度进行审视,因为每个个体的发展都是由一种社会身份转变为另一种社会身份的过程。而要对社会分层进行深入认知,从社会的层面更便于理解,因为社会成员通常是被社会相关机制分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社会流动和分层是社会的基本现象,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戴维·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曾就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进行过统计,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较为权威的社会学刊物上刊载的关于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学术论文一直保持在每年25%左右的发表量上,这个统计数据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反映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和价值。^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我国社会分层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存在十个社会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位于最低阶层,其次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再次为“产业工人”,而农民工属于“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成员。由此可见,位于我国社会最低阶层的便是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便是我国目前农民社会分层的基本境况。^②

而学校教育在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流动和分层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社会成员身份转换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教育被广大人民群众视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描述。以往有关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使人认识到教育在实现社会流动和分层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上发挥着

① [美]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马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vii页。

② 王一涛:《农村教育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基于英县的个案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重要作用。邓中(Deng)和崔曼(Treiman)在其研究中就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①布尔迪厄在其研究中也曾说过:“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条件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化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②余秀兰曾用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在教育的获得上明显处于劣势,并与城市孩子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与此同时,农村孩子努力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明显少于城市孩子,所遭遇的困难更多。因此,她强调文化再生产的现象在教育领域也一样存在,并对受教育者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城乡之间业已形成了不正常的相对封闭的“城市优势文化圈”与“农村劣势文化圈”。而“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是强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更隐蔽的文化因素”^③。秦行音在对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到,教育曾经是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可行途径之一,但是当前农村孩子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原来处境却越来越困难,而农村基础教育分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④因此,不断向城市流动的趋势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村落处于文明的底层空间,使得最需要发展的乡村社会变成了最缺乏发展所需人才的区域,这些发展乡村社会的人才在制度化的城市导向教育下逐渐被城市掠夺。正如一个村小教师所言:

现在你们只要到村子里去转转就会发现,几乎就剩下些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走了,不愿生活在村子里了,部分青年人书读得好,毕业了到城

①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页。

② [法]P.布尔迪厄、J.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页。

③ 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④ 秦行音:《社会分层对农民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5年第22期。